

杨钟贤 李解民 吴树平 选评

史记

珍藏本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华古典名著文库少年版

珍藏本

史记

杨钟贤 李解民 吴树平 选评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史记/ 吴树平等评注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1. 5

(中华古典名著文库少年版: 珍藏本)

ISBN 7-5007-5479-5

I. 史… II. 吴… III. 史记—评注 IV. K204.

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49391号

SHI JI



出版发行: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

作者: 杨钟贤 李解民 吴树平
责任编辑: 张 彤

封面设计: 周建明
版式设计: 刘 静
责任印务: 书 慧

社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电话: 086-010-64032266

传 真: 086-010-64012262

24 小时销售咨询服务热线: 086-010-84037667

印刷: 张家口市印刷总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印张: 22.375

2001 年 5 月河北第 1 版

2002 年 2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

字数: 415 千字

印数: 15001—26000 册

ISBN 7-5007-5479-5/G·4271

定价: 29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本社出版科退换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

序

《史记》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篇巨著，它上承先秦史学的优秀传统，下启百代史学的发展，是中国史学和文学领域具有经典地位的杰作，影响至为深远。古今学者对它推崇备至，南宋大学问家郑樵说：“六经之后，惟有此作。”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说：“史迁绝学，《春秋》之后，一人而已。”鲁迅先生的评价，那是再精辟不过了，他于所著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认为《史记》是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简而赅的评断，揭明了《史记》的特殊地位。

《史记》这部史家绝唱，出自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之手。司马迁字子长，左冯翊夏阳（今陕西韩城县）人，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（公元前145年）。司马迁在孩童时代，“耕牧河山之阳”。十岁随父来到京师长安，开始学习古文。后来跟着儒学大师董仲舒、孔安国学习《公羊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。汉武帝元朔三年（公元前126年），司马迁二十岁，满怀求知的欲望，漫游名山大川，



考察古迹,搜集遗闻,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。这使司马迁开阔了胸怀,增长了知识,为尔后撰写《史记》作了很好的准备。

司马迁结束漫游,返回长安后,出任郎中。郎中虽然位卑秩低,但却是步入仕途的阶梯,又有机会接近皇帝。元鼎年间,武帝或巡行,或祭祀,或封禅,司马迁常为扈从。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年),司马迁奉武帝之命,出使巴、蜀以南,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。这些活动,使司马迁亲身感受了社会现实,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。

在司马迁的史学生涯中,有一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物,这就是其父司马谈。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担任太史令,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搜集史料,研究天文历法。司马谈知识渊博,撰有《论六家要旨》,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派别进行了总结。他身为太史令,最大的愿望是编写一部通史。元封元年(公元前110年),司马谈随武帝东巡泰山封禅,刚到洛阳便重病不起。适逢司马迁出使回来。司马谈弥留之际拉着司马迁的手,泪流满面,嘱咐他一定要继承父志,撰写一部通史。司马迁俯首流涕,接受了父亲的遗命。他能在尔后的岁月里,以顽强的毅力、喷薄的激情完成《史记》,与司马谈的遗嘱是分不开的。

元封三年(公元前108年),司马迁出任太史令,从此,他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,为撰写《史记》提供了必备的条件。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,司马迁完成了国家改革历法的工作以后,便开始撰写《史记》,也就是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里提到的“论次其文”。在撰写过程中,横祸降临。天汉二年



(公元前99年)秋,李陵率军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,因孤军深入,被匈奴重兵包围,全军倾覆,李陵投降匈奴。汉武帝就此事询问司马迁,他怀以拳拳之忠,坦陈己见,认为李陵投降,是由于寡不敌众,又无救兵,责任不全在李陵一人。李陵并非真降,是找机会报答汉朝。这一下触怒了汉武帝,认为他是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,贬责武帝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。于是,司马迁身陷囹圄,受了腐刑,这时已是天汉三年。平日那些亲友显贵竟无一人挺身救助,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受到难以忍受的摧残,痛不欲生。仅仅因为他顾念《史记》还没有完成,才隐忍苟活下来。这次腐刑之祸,对司马迁灵魂的撞击之重是可以想见的,撰写《史记》的动力和境界,由此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。

三年后,司马迁被赦出狱,担任中书令,成为皇帝身边的秘书,负责掌管文书,起草诏书,表面上很荣耀。但这一官职,只有宦官才能充任。表面上的荣耀,怎么也遮掩不住实际上的耻辱。司马迁与命运抗争着,终于超越了自我,把血与泪全部凝结在《史记》之中。

太始四年(公元前93年),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信给他,他回了一封信,即有名的《报任安书》。其中说:“仆窃不逊,近自托于无能之辞,网罗天下放失旧闻,考之行事,稽其成败兴坏之理,凡百三十篇。”看来这时《史记》已经基本写就。

司马迁去世年代,向无定论。因缺乏足以定论的材料,很难指出确切年代。大体说来,应该卒于武帝末年,也有人认为卒于昭帝时期。



《史记》全书 526500 字，书名“太史公书”。早期，学术界也把《史记》称作“太史公记”、“太史公”。“史记”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。东汉末年，学者著述中已称《太史公书》为《史记》。三国时期，“史记”成为司马迁之书的专名。

《史记》由五个部分组成，最前面的是本纪，下面依次为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。本纪按朝代记述帝王史事，凡时间可考的，均系以年月。内容主要记述帝王言行政迹，兼述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外交、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国家大事。实际上，它是一部编年体的帝王简史，可视为全书的纲要。本纪中有两篇记载的不是帝王，一篇是《秦本纪》，所记为春秋战国时秦国历代诸侯。秦始皇与旧时秦国一脉相承，他即帝位之前已是秦国诸侯王，所以，司马迁以春秋战国之秦列入本纪，也符合情理。另一篇是《项羽本纪》。项羽虽然没有统一全国，但他自封为西楚霸王，拥有九郡，分封诸侯，号令天下，俨然一代君主，为项羽撰写本纪，也是从实际出发。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变迁，记事方法也是按年系事，等于诸侯的本纪。个别人物，如孔子、陈涉，虽非王侯，但其行事和影响却与一般贵族大臣迥然有别，其地位和影响不在诸侯王之下，所以，也列入世家。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，上层勋臣士大夫，下层各领域的代表人物，均可入传。对于四边的少数民族，也撰有专传。书是有关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，内容包括政治、经济、礼乐、天文历算等重要领域。表采用表格的形式，简明扼要地标注人物和事件。

《史记》的五个组成部分，分则独成体系，有各自的完整性，



记事方法和内容有所不同,合则彼此关联,互为表里,相互补充,有机地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庞大体系。全书的中心是本纪,世家、列传的取舍均与本纪有内在的联系。立足本纪去阅读世家、列传,便会把握整个的历史背景;而配合世家、列传去阅读本纪,才会对本纪增加许多生动具体的认识。本纪、世家、列传,基本以人物为主要线索。书则不同,它以社会的不同领域为专题,详述制度的兴替沿革,完全是对本纪、世家和列传的补充,使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画面。

在《史记》的五个组成部分中,本纪与列传是全书的主体,所占篇幅最多,因此,人们把《史记》的体裁称之为“纪传体”。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创举。从此以后,历代史学家沿其规制,编写了大量的纪传体史书,名声最著的莫过于二十四史中《史记》以外的二十三史。笔者编辑的《二十四史外编》搜罗纪传体史书二十多种,也都是纪传体的著名史作。二十三史和《二十四史外编》,以及晚出的《清史稿》,虽然在体制上与《史记》不完全相同,如《汉书》无世家,书改称志,一些史书既无世家,也无表、志。但是,诸史却无一例外的有纪有传,均未超出司马迁创设的体制。由于纪传体史书体制宏大,能够突出帝王的中心地位,真实地反映君臣父子、上下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度,又可以分门别类地容纳历朝的典制,所以,特别受到当权者的重视,成为各朝“正史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序》说:继司马迁《史记》、班固《汉书》之后,“世有著述,皆拟班、马,以为‘正史’。”到清乾隆年间,钦定以《史记》为首的二十四史为“正史”。纪传体史书的这



种特殊地位,是编年体、纪事本末体等各体史书所无法比拟的。

《史记》记事的上限起于传说时代的黄帝,下限学术界说法不一。有两种说法赞同者比较多,一种说法认为终于武帝获麟的元狩元年(公元前122年),一种说法认为终于太初年间(公元前104年至前101年)。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武帝时期,历时三千年左右。司马迁把如此之长的历史载之于《史记》,从而使《史记》成为贯穿古今的通史,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。司马迁之前,也出现过不少史作,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世本》、《秦记》、《楚汉春秋》等,都是不同时代的史学代表作,不具备古今通史的性质,在时代空间上有一定的局限性。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期,经济繁荣,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,文化勃兴。奋发昂扬的时代气息,给司马迁撰写古今通史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。汉兴秦亡,原因何在,对于当时的史学家来说,是一个迫切需要总结的问题。再往上推溯,历代的兴亡,都需要思索,寻找出规律,作为汉代统治者施政的借鉴。司马迁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和时代呼唤下,完成了他的史作,从远古,到当代,悠远而恢弘,体现了汉武帝时期的辉煌。

史书是叙述史事的,编撰一部优秀的史书必须拥有大量的历史材料,然后经过剪裁加工,才能熔铸成材料丰富、信而有征的史作。在这一方面,司马迁不愧为史学巨匠。他编写《史记》的过程中,取材相当广泛。在《史记》一书中,提到典籍就有一百余种。当然,司马迁披阅的典籍远不止此数。《汉书·司马迁传赞》提到的司马迁修《史记》是“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,采《世本》、《战



国策》，述《楚汉春秋》”，仅这五种书，就有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三种在《史记》中没有言及。由此可以推知，司马迁占有的史籍该有多么宏博。除了史籍，司马迁还利用了国家的档案文书。他身为太史令，管理档案文书是其所职，阅览和利用这些档案文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《史记》中有关汉诸侯、功臣诸表，均取材于国家收藏的《功令》、《列传》、《令甲》，舍此而别无他途。司马迁到各处实地调查来的材料，也是《史记》的重要材料来源。这些材料范围颇广，有对地理的勘察，有对古迹的调查，有对历史人物的探寻，有对当事人的访察，有对歌谣俚语的搜集等等，各种各样的材料大大拓宽了《史记》的取材范围。

对于得自各种途径的材料，司马迁确定了严格的“义例”，进行材料的选取和组织。所谓“义例”，又谓之“书法”、“凡例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修史时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。从《史记》本身来寻找，可以把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归纳为以下几项：第一，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。司马迁在《伯夷列传》中明确地说“考信于六艺”，“六艺”即六部儒家经典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现，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非的准绳。所以《孔子世家赞》说：“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。”基于这一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，司马迁一方面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排比甄别，或者采录，或者扬弃；另一方面，把大量六艺经传作为可信的史料，经过剪裁，直接熔铸于许多篇章。第二，信从原始资料。原始资料比较接近事件发生的时代，记事者比后人容易了解事物的真相，这就相对提高



了史料的可信程度。所以,司马迁在《五帝本纪赞》中提出:“不离古文者近是。”所谓“古文”,就是采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典籍,产生的时代较早,是司马迁撰修《史记》重点取材范围。有代表性的是古文《尚书》,司马迁早年曾专门学习此书,修史时采摘颇多。对古文书写的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典籍,也多有采录。第三,重视实地考察获取的材料。司马迁为了搜集第一手材料,游踪遍及汉代半壁江山,对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,大量纳入《史记》。如《淮阴侯列传》载:“吾如淮阴,淮阴人为余言,韩信虽为布衣时,其志与众异。其母死,贫无以葬,然乃行营高敞地,令其旁可置万家。余视其母冢,良然。”司马迁利用实地考察材料撰写的历史文字,人们读起来,感到特别亲切和可信。第四,“择其言尤雅者”,意思是说选择记述可靠的。司马迁得到的材料,百家杂陈,众说纷纭。面对这些材料,司马迁提出了“择其言尤雅者”的选材原则。他对同一人物、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,进行比较,去伪存真,实事求是地表述历史。在这一方面,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黄帝的记载。从战国至汉初,黄帝是人们的热门话题,各家著作,没有不大谈黄帝的。但所谈大多神乎其神,荒诞不经,用司马迁的话来说:“百家言黄帝,其文不雅训。”在这种情况下,司马迁表现了一位严肃史学家的治学精神,他“择其言尤雅者”,只撷取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姓》中较为可信的文字作为修史的素材。第五,疑难之处,或存疑,或略而不书。由于各种原因,史料歧异,或者没有可信的史料,本是正常的事情。遇到这种情况,如果任凭己意取舍其一,难免不失之武断。司马



迁在《三代世表》中提出“疑则传疑”，在《仲尼弟子列传》中又提出“疑者阙焉”，不失为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。《史记》中《五帝本纪》、《夏本纪》、《殷本纪》和《三代世表》不标年月，只载世系，就是这种科学态度的最好体现。

司马迁对自己的史学巨著作过概括性的评价，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，他撰写《史记》，“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人们于此不但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观，也可以看出撰写《史记》的宗旨。

“究天人之际”，就是探究天与人的关系。天人关系，是一个古老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。殷周时代，宗教神学统治着思想界，那时虽然有对宗教神学的怀疑和否定，但都显得非常微弱，无法动摇基础坚固的宗教神学。宗教神学中心的话题是把帝王拥有的一切解释为上天所赐，天道不变，王权永恒。任何一个帝王都乐于接受和维护这一理论。一直到汉武帝时代，董仲舒仍大张旗鼓地倡导天人感应神学论。司马迁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史学家，由于前人唯物主义思想的启迪，历史事变展示的客观规律，使司马迁回答天人关系时有了新思维、新观点。他在记述许多人物和事变时，割断了天与人的宗教联系，从社会关系中去探索人事、政事、国事的兴衰成败。同时，把对自然现象的科学探讨和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迷信色彩加以分别，承认自然现象的真实性，否认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虚妄，这些认识，在今天看来，算不了什么。但在当时，却是站在思想理论界的峰巅。当然，也不必讳言，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理解，没有彻底从宗教神学的阴影中摆



脱出来。在《史记》中,有时看到司马迁从宗教神学圈子中走了出来,有时,他又返回老圈子中徘徊。这种对宗教神学的怀疑与信从、否定与肯定的并存,反映了司马迁思想深处的时代烙印。

“通古今之变”,就是研究古今历史的变化。历史是凝滞不变的,还是不断发展变化的,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。司马迁承认历史的可变性,所以,他用人物和史事记述了三千年历史的发展态势,并揭示了历史变化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。其内容略古详今,粗线条的勾勒夏、商、周,而对战国、秦、汉历史则条分缕析。他通过“原始察终”,来“见盛观衰”,“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,做到以古为镜。司马迁对历史的这种洞察力,对历史的把握和运用,已经向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。虽然司马迁在“通古今之变”时,没有摒弃机械循环论的影响,但与当时的思想理论界权威董仲舒提出的“天不变,道亦不变”的观念相对比,还是高明得多。

“成一家之言”,就是建立独成一家的思想体系。从这里,我们看到了司马迁的宏伟志愿和博大胸怀,也看到了他敢于从事开创性劳动的个性。在司马迁之前,史学还谈不到成“家”成“派”,早期史官所修史书,尚难目为“一家之言”,史学被包容在《六经》之中。是司马迁在史学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,他采摘《六经》异传,整齐百家之语,融会各家学说,综合古今学术,辨别源流得失,首次运用纪传体裁,以人物为中心勒成第一部中国通史,多侧面地展示历史的变迁,谈古论今,“继《春秋》,述往事,思来者”,从而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、完整的学术门类,在中国史



学发展史上竖立起第一座划时代的丰碑,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。

《史记》作为一部史学名著,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,是今天人们学习和研究先秦史和秦汉史最基本的史书。从记事内容上来看,略于先秦,详于秦汉,一百三十篇中,有七十八篇属于秦汉史料。这些史料,无论对于研究先秦史,还是汉武帝以前的西汉史,都是不可多得。特别是有关秦汉的记载,可视为珍贵的原始材料。后来班固撰写《汉书》,武帝之前的纪、传,基本上移用了《史记》。如果能把本纪、世家、列传通读一遍,那么,对于中华民族的西汉初期以前的几千年文明史,应该了然于胸。

至于书中八篇书,分述历代典制,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论述礼、乐的社会作用,《律书》、《历书》记录音律、历法,《天官书》叙述天文,《封禅书》记载祭祀天地山川典制,《河渠书》记述西汉河渠水利,《平准书》载录西汉盐铁政策和钱币制度,都是某一特定领域的专史。八书与纪、传、表相辅相承,互为补充,组成了恢宏的历史画卷,成为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经典之作。

《史记》不但是史学杰作,而且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。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传记文学,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。完璧归赵的蔺相如,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荆轲,叱咤风云的项羽,豁达大度、不拘小节的刘邦,用兵如神、横扫千军的韩信,在作者笔下,形象生动,栩栩如生,真是呼之欲出。面对蔺相如怒叱秦王,视死如归的气概,你不能不击节称叹;伴随项羽这个盖世英雄的人物形象的变化,你不能不感情震荡。司马迁奇妙绝



伦的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,在尔后出现的所有纪传体史著都不能望其项背。

传记文学必须尊重历史事实,不能脱离现实进行纯性的艺术虚构。在历史与艺术的融合上,司马迁找到了最佳的契合点,充分地展示了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内容。上自巍巍皇室、公卿侯王、达官显贵,下至地方豪绅、社会名流,乃至鸡鸣狗盗之徒,都有具体的记述。对于一个文史学家来说,描述一般的社会层面,并非难事,如果触及最高当政的隐私,便要具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。司马迁敢于秉笔直书,尊重历史,《高祖本纪》通过具体的事例揭露了刘邦的虚伪狡诈和迹近流氓的习气,在一些人物传记中描述了刘邦怯懦卑琐、猜忌臣下和杀戮功臣。《史记》本来有《今上本纪》,记载当时的天子汉武帝,但被武帝“怒而削去”,之所以如此,肯定其中的文字触犯了皇权和时政。《史记》内容的深刻性,于此可以窥见一斑。

司马迁不愧为语言艺术大师,《史记》对历史事件的叙述,典雅、简炼、流畅、自然,精彩之处,如诗如画,美不胜收。人物语言各具特色,绝无雷同,口语、俗语、方言、歌谣融汇其中,鲜活生动,富有感染力。人物传记中论议和抒情,是非分明,感情真挚,往往使人物形象得到升华,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。

《史记》杀青之后,司马迁亲手抄写正本、副本两种,司马迁的女婿杨敞藏有一种抄本。杨敞在昭帝时官至丞相,他曾让《史记》部分篇章传布于外。敞子恽“始读外祖《太史公记》”,并把全书宣布于世。但是,西汉末年,《史记》仍不易得到。东汉初期,



《史记》仍局限在社会上层流传，人们得到的是一些单篇抄本。皇帝把个别篇章赐给臣下，都是有针对性的，被朝廷上下视为一种特殊的恩宠。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，《史记》才在文化界流传渐广，进入了一般士大夫之家。

据司马迁所说，《史记》有本纪十二篇，表十篇，书八篇，世家三十篇，列传七十篇，共一百三十篇。但是东汉初年，班彪、班固父子二人已指出《史记》有残缺。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载彪之言云：“太史令司马迁作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书、表，凡百三十篇，而十篇缺焉。”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载固之言，也说《史记》“十篇缺，有录无书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于《太史公百三十篇》下载班固自注云：“十篇有录无书。”班彪、班固父子治学严谨，又去司马迁仅百年左右，他们所言不会有误。遗憾的是，他们没有说出十篇篇名。后来，三国时魏人张晏开列了所亡十篇篇目，它们是《景帝纪》、《武帝纪》、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、《律书》、《汉兴以来将相年表》、《日者列传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龟策列传》、《傅靳蒯列传》。研究《史记》亡篇的学者，有的支持张晏的说法，也有不少人持有异议。众说纷纭，互相驳难。由于缺乏绝对可靠的材料，很难定论。大体说来，在班氏父子时代，《史记》残缺十篇，残缺程度不一，既有整篇，也有部分章节。

古代人写书还是比较随便的，整段引用他人的文字司空见惯，缀补别人的撰述也是常事。《史记》出现缺失，便有了增补者，汉元帝、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便是其人。他补续的篇章有《武帝纪》、《三代世表》、《建元以来侯者年表》、《外戚世家》、《梁



孝王世家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四叔列传》、《滑稽列传》、《龟策列传》。

有的学者认为《陈涉世家》标明“褚先生曰”，所以也论定为褚少孙续补。但古本《史记》“褚先生曰”或作“太史公”，《陈涉世家》是否存在褚少孙补笔，很难得出令人坚信不疑的结论。《张丞相列传》、《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》两篇，也有人怀疑揉入褚少孙笔墨，但同样缺乏确证。

历代出现过不少学者注释《史记》。根据今天能够看到的材料，最早作注的是东汉延笃，他撰《音义》一卷，又有佚名者作《章隐》五卷，两家注释，早已失传。南朝刘宋裴驷撰《集解》八十卷，是今年能够见到的最早的《史记》注释。唐代注释《史记》的工作受到学者重视，不但注释者增多，而且出现了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，即司马贞的《索隐》和张守节的《正义》。裴氏《集解》主要利用儒家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，吸收了不少前人成果。司马氏《索隐》比《集解》向前跨越了一大步，不仅注音，还注重释义，音义并重。张守节撰《正义》倾注毕生精力，注音释义都比较严谨，对地理的注释尤为详明，质量比《集解》、《索隐》又有所提高。裴氏、司马氏、张氏三家的注释，被公认为古代最有权威的训释之作，人们习惯上合称“三家注”。

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《史记》应该是必读之书。为了帮助一般读者学习，我们选取了《史记》中的重耀篇章，加以注释和翻译。对本纪部分，比较注意系统性，五帝、夏、殷、周诸本纪全部入选，这样可对秦以前的中国历史能够有一整体的了解。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统一全国的第一个皇帝，功也显赫，过也昭